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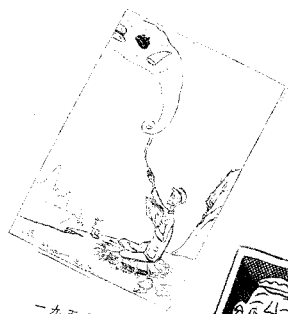
1957年 乌昼啼



“鸣放”期间杂文小品文选

段跃 编

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



一九五七年
三月 號



本期的明星畫像

長江

新觀察

一九五七年 第二期 一月十六日出版

中国电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乌“昼”啼:1957年“鸣放”期间杂文小品文选/段跃
编. -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8. 12

ISBN 7-106-01413-3

I. 乌… II. 段… III. 杂文-中国-当代-选集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36154 号

责任编辑:秦 赞

封面设计:屈剑峰

谭雄军

乌“昼”啼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北京市通州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9.875 插页:4

字数:450 千字 印数:10000 册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106-01413-3/I·0206

定价:29.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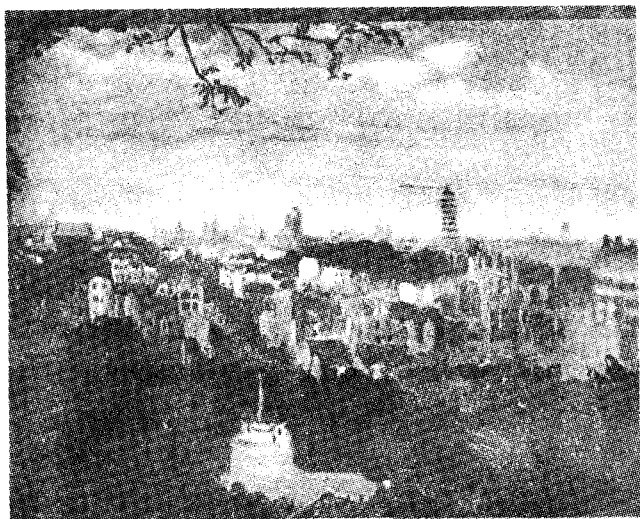
新观察

一九五七年 第二期 一月十六日出版



黄子凡

《新观察》封面



一九五七年
三月 號

長江文藝

《长江文艺》封面

新民報 晚刊

零售每份1元2角 本報訂閱4分	1957年	第3888分 今日第5版
本報市黨部發行	5月	第8版
零售發售時間(5.30)	(星期日)	(附刊)
		社址：上海(99)福州路30號
		電話：17807 轉機房部

中國青年報

第917号 1957年1月29日 星期二 本報共四版
夏曆丙申年十二月二十九 初五立春

社址：上海福州路30號
電話：17807
零售每份1元2角
本報訂閱4分
本報市黨部發行
零售發售時間(5.30)

文匯報

1957年1月
31
本報共四版
社址：上海福州路30號
電話：17807
零售每份1元2角
本報訂閱4分
本報市黨部發行
零售發售時間(5.30)

《新民報晚刊》、《中國青年報》、《文匯報》報頭

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地——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这作品为“讽刺”。

讽刺作者虽然大抵为被讽刺者所憎恨，但他却常常是善意的，他的讽刺，在希望他们改善，并非要捺这一群到水底里。

——鲁迅

序一

李 锐

《乌“昼”啼》的编者嘱我为此集的出版写篇序言,终于从命,是由于自己同杂文有过缘分,几年前还出过一本杂文集。

在学校读书时,我就喜欢鲁迅的杂文,从而影响了我的思想和政治倾向。到延安后,参加过《轻骑队》的活动,写过讽刺性的杂文。虽然《轻骑队》的文章很得毛泽东的赞赏,整风运动开始后,仍然免不了受批判和作检讨。大家知道,写《野百合花》的王实味当年曾被定为托派、特务。尤其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认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提法不当时,更把反杂文提到“理论”和政策的高度。于是1949年后,这种精神推广到全国,那种尖锐泼辣、针砭时弊的杂文,可说绝了迹,报刊上很少见有不同的音符,出现了令人痛感到的舆论一律。

1956年苏共二十大揭开斯大林问题的盖子后,隐藏在专制体制下的阴暗面昭然于世,震撼了每一个真诚的共产党人的灵魂。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各国都开始对斯大林模式进行反思。1956年毛泽东提出“十大关系”、双百方针,《人民日报》改出八版,杂文才又开始重新复活。记得那时是胡乔木主其事,提出改版后的《人民日报》要发表杂文,还提出一个作者名单。我虽然在工业系统工作,也应邀参加过《人民日报》为此而召开的座谈会,出席那次座谈会的有

序

王任叔(巴人)等。在这样的倡导鼓舞下,人们又写起杂文来,我也乘兴写过几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八版。1957年1月知识分子会议,2月最高国务会议,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这些会议的内容和毛泽东讲话广泛传达。广大知识分子包括杂文作者,确实感到一种早春天气的到来,都觉得应当为双百方针作贡献,从而报刊登出许许多多的杂文和小品文、随笔。收入本书的就是这些千呼万唤始出来的作品,当年发表在《人民日报》、《新观察》、《中国青年报》、《文汇报》等报刊上。

可是,随即于5月开始布置,6月正式发动的反右派斗争中,这些杂文作者大都纷纷落网,被打成右派分子。几个月前是求言诏求言,现在是言者有罪。就政治道德、政治信誉而言,当然蒙受了难以挽回的损失,直到今天还得来还这笔债。当年有个说法,右派言论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些杂文大都是拿来给作者作罪证以定案的。今天重读这些文章,是否反党反社会主义呢?可以说正好相反:篇篇都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治健全的,都是恨铁不成钢的肺腑之言。这些意见如果当年不是受到批判,而是得到采纳的话,那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现的局面,就可能提早20年到来了;这些杂文的意见和主张,并没有越出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和方针。

比如,巴人在《论人情》中指出,人除了阶级性,还有人类共同的本性。社会主义社会应高扬人道主义。徐懋庸曾犯过严重的“左”的错误,这时在《不要怕民主》一文中说:“现在有些干部却实在是在嫌民主太多,而且愈来愈怕民主。我看,对百花齐放的怕,对百家争鸣的怕,尽管动机有好坏,理由有工拙,实质上都是对民主的怕。”本书书名“乌‘昼’啼”是上海外国语学院教授徐仲年当年写的一篇杂文的题目,该文主要是谈党群关系,共5节,《人民日

报》从《文汇报》转载时，删去两节。文章从“风鸣”比喻“报喜”，“乌鸣”比喻“报忧”谈起，以为“乌鸦是益鸟，向人‘报喜’的喜鹊反而是害鸟”。要害是第二节谈“毛毛雨下个不停”（黎锦晖的一句歌词），毛泽东曾引用来说明“和风细雨”的重要。可是文中说：“毛毛雨下个不停是有害的，下得久了，秧要烂，棉不结铃。”“和风细雨自有他的妙处，但迅雷烈风也有扫荡阴霾之功。某些时候，错误严重，态度顽强，那就得用迅雷烈风了；在这种情况下，和风细雨不足以平民愤。”开始反右派后，毛泽东针对这篇杂文，在上海干部会上说：“他们还说，你们共产党就不公道，你们以前整我们就是急风暴雨，现在你们整自己就和风细雨了。现在右派还要挖，不能松劲，还是急风暴雨。”

因此，我认为，《乌“昼”啼》一书是一份特别有意义的历史记录与历史文献，值得推荐，值得一读。温故而知新，想想当年因这些文字而罹难的作者，所付出的代价，后来者更有责任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并且从中对照今天，应当吸取逆耳忠言，使我们各方面的生活更健康起来。

1998 年 11 月

序

序二

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李慎之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被称为中国的大逆转，但是这个“逆转”的转折点到底在哪里呢？

从表面上看，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毛主席在共产党内部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使一场开始了才一个多月的“鸣放”顿时夭折。紧接着，讨伐右派分子的运动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展开，运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一九五七年底才算基本结束，到一九五八年底才最后封刀。真是“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六月八日可以算是转折点了。对这一点，史家是不会有异议的。但是，引人寻思的是，毛主席在上半年一而再，再而三，可以说是几十上百次地号召人家鸣放，鼓励人家鸣放，而且一再批评党内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思想不通，为什么一下子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呢？这是简在帝心、乾纲独断的事情，除他本人以外，也许不会有第二个人能确切地知道这个最高机密。当代史家对此多有探

序

讨,甚至有人说,这是毛主席四月三十日请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以后,没有料到鸣放如此放肆,忍无可忍,才在五月十五日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的内部文章,这才是形势真正的转折点。然而这些同志也未免太低估毛主席了。毛主席是何等样人物!平生军事的、政治的、大战场、小战场经历过不知其数。就以我所知的苏共二十大以后,他单从《内部参考》和《参考资料》上看到的而且必然看到的国内外批判共产党的话就不知有多少,他怎么能为罗隆基的一句“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就沉不住气而龙颜大怒呢?毋宁说为大鱼游入网内而高兴的可能还更大些。毛主席是一个伟大的战略家,正如陈毅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的诗里所说“从来能兵观远略,于今筹划赖雄才”,不论是对付国民党的八百万大军,还是对付中国的五百万知识分子,毛主席都是伟大的战略家。

—

《人民日报》的六八社论和中央的六八指示都是执行了毛主席将近半年以前的既定决策。这个决策才是从鸣放到反右真正的转折点,才是中国命运的大逆转的转折点。

这里指的是一九五七年一月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十八日、二十七日两次讲话,合共两万字,可以说已经十分清楚地阐明了他关于在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以及如何对付的理论了。这两万字中,可圈可点可摘的东西实在太多。但是至少下面一段比较充分地说明了鸣放的意图以及以后的反右派斗争的关系:

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不

错的可以补足我们的短处；错的要反驳。至于梁漱溟、彭一湖、章乃器那一类人，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经过讨论，争取多数，使他们孤立起来。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从反面教育人民，我们对待民主人士要又团结又斗争，分别情况，有一些主动采取措施，有一些让他暴露，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55页）

就在这篇讲话的上下文，毛主席还说：“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都隐藏着。”“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如果有人用什么大民主来反对社会主义制度，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就对他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这不是已经把引蛇出洞的战略部署说得清清楚楚了吗？难道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还有什么疑问吗？

大概就是由于这一点，毛主席自称：“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当然，“有人”又会说，“你那是在内部会议上讲的呀？”但是，毛主席在六月八日以前近半年时间里，每次讲话的时候，确实都没有忘了说“毒草锄了可以当肥料”这样的话，你没有参透其中奥妙，你只好自认晦气。

看了这些话，对于《事情正在起变化》、《这是为什么？》、《文汇

序

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这些火气极大的文章，本来是不应该惊讶的了。但事实并非如此。绝大多数的人都感到始料不及(当然这些人中也有不少人是深感痛快与解气的)。这时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这一次会议是党内高干会议，与早两个月召开的八届二中全会(那一次是引蛇出洞的方针初见端倪而尚未最后决策的会议)相同，传达的范围有限，就我本人来说，就因为随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欧十一国，两次传达都没有听到(前一次略知一二)。第二个重要得多的原因是，在一九五六年二月的苏共二十次大会上，赫鲁晓夫揭发了斯大林的错误，对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震动极大。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引发了一种社会主义、共产党必须改弦更张，更加宽容、民主的看法。毛主席本人以及中国共产党全党在一九五六年全年也都有这方面的言论。毛主席引蛇出洞的决策，应该是在十月份的波、匈事件以后开始考虑的，而一旦形成，他就亲自执行，全力以赴地做“引”的工作。其第一个标志就是一个月以后，也就是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在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毛主席极其开放的口吻，至少是建国七年多以来到那时为止没有听说过的开放的口吻，甚至极有风趣的口吻，鼓励大家学哥白尼、布鲁诺，做“志士仁人”。接着，他又在三月十二日邀请许多党外人士参加的党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内容更加开放，提出“不要围剿王蒙”，“中央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吗？”，“鲁迅不但反右而且也反左”，“现在不是放得过多，而是放得不够，不要怕放，不要怕批评，也不要怕毒草”，三天以后，他老人家又风尘仆仆一路南下。三月十六日起程，三月十八日在天津，三月十九日在南京，三月二十日在上海，四月份又到杭州，自己说自己“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南京讲话)，游说大家鸣放，这样一直到四月三十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恳切地请民主党派帮

助共产党整风。毛主席不但是一位运筹帷幄的最高统帅,也是一位制敌机先的前线总指挥。五月一日整风正式开始。因此《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一种有点特别的声音夹在一年多鼓励人“解放思想”的言论甚至指示中间,不但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从现在出版的许多回忆录看,好像连后来成为反右积极分子的党员干部也没有怎么注意。所以毛主席才一再说党内干部有百分之九十想不通他号召鸣放的主张。

关于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的报告既然是秘密报告,中共当然也不会公开宣传,但是事实上中国人知道的范围很广。因为中央决定把朱德从莫斯科带回来的译文印成小三十二开的小册子,封面上题目都没有,只印有“内部材料·注意保存”八个字,随《参考资料》发放。《参考资料》虽然只发到高级干部,但是并不算是机密刊物,也只是在刊头上印有“内部刊物,注意保存”两行字。因此这个报告的内容实际上传播相当广。另外,外文书店还发售美共的《工人日报》,上面也载着报告的英译文的长篇摘要,北京各大学的学生竞相购买,竟致把《工人日报》买光。尤其是毛主席当时一再发出要打防疫针,种牛痘的主张,《参考消息》由于他的旨意而由两千份扩大发行到四十万份,连大学生都可以订阅。看来他并不反对这个报告的内容从各种渠道泄漏出去。因此,这个报告已算不得什么秘密了。(按:《参考消息》不能登赫鲁晓夫报告,但是可以登各国的反应。)

序

不过,有一点不能不说的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即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公开发表时已在六月十九日,反右派斗争已经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了,而且其中删掉了许多开明的话,却增加了本来没有的六条政治标准。至于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发表时已到一九六四年,不但上面提到的话完全不见,而且只剩下强调敌我矛盾的话,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批判中大起作用。正

因为如此,许多人怎么也不能信服这是“阳谋”。

最为平实的说法是:不管是阴谋还是阳谋,总之都是预谋、是蓄谋。

二

对于毛主席来说,虽然前面已经说过,他一生经历过无数的挫折与屈辱,但是苏共二十大给他的刺激也许是最大的刺激,因为这是他已经达到权力颠峰后的刺激。这个刺激看来支配了他晚年整整二十年的生命。

一九五六年本来是毛主席认为“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开头就让他高兴。一月十五日,北京公司合营的工人、店员、资本家、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社员,还有农民和各界人士共二十万人集合在天安门广场上,锣鼓喧天,鞭炮震耳。毛主席在城楼上接受了北京市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喜报。北京市市长彭真宣布“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了”。用毛主席后来自己的话说:“自一八四〇年以来一百一十六年”的奋斗目标已经达到了。

毛主席是永远的革命家,他的思想是决不肯到此止步的。一个目标的完成在他只是第二个目标的开始,这年刚开年,他就指示新华社要“把地球管起来”。话只有一句,新华社的同志因为参不透他老人家的的心思而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违抗毛主席指示”的批判,但是深信毛主席又要有一番新的宏图大略则是没有人怀疑的。一月份,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周恩来宣布中国知识分子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了。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即一月二十日,毛主席讲了话,他一方面说到中国在各方面还落后,一方面提出中国“要在一二十年

内赶上国际先进水平”，“最多一百年……应该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文化、科学、技术、工业发达的国家”，并且一再提出共产党就是“社会主义促进会”。可以看出，毛主席的心气有多么高；也可以看出，后来的大跃进的思想已经开始在他脑子里萌生了。

但是，照毛主席自己的说法，一九五六年又是“多事之秋”，大大扫了他快快建设社会主义的兴头。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写的说明中说：

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26页）

毛主席说的国际方面的风浪就是指那年春天二月十四日至二十五日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实际上是闭幕以后）赫鲁晓夫发表的揭露斯大林的问题以及由此在东欧以至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引发的一系列事件。他说的国内方面的事情是指一九五六年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根据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意图起草的反冒进的社论。据吴冷西在《忆毛主席》中说：毛主席在社论最后送他审阅的时候，只是在自己的名字上划了圈，并且写了“我不看了”这四个字。到一九五八年一月他在专门为此召开的南宁会议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这件事他隐忍了整整一

年半,在反右派斗争大获全胜以后,才找到机会出了这口气。

赫鲁晓夫揭发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凡听到或看到的人无不毛骨悚然。连毛主席也第一次发明了一个词,说这是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但是毛主席是以斯大林自居的人物,要他承认他以为“无比美妙”的社会主义中能有这样的阴暗面无疑是十分困难的。因此他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两点评价:“揭了盖子,捅了漏子。”当时,今春以八十五岁高龄逝世的新华社原副社长陈适五就跟我说:“毛主席此刻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

说毛主席“一则以喜”,是指斯大林的错误公开了,中共与苏共历史上争论的是非也可以公开了。中共受苏共的委屈也可以一舒愤懑了。现在世界上再没有人可以压在中共头上指手划脚、说三道四了。毛主席现在可以得到完全的自由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了。他要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至世界革命的领袖的道路也已经敞开了。

说毛主席“一则以惧”,是指过去历来被认为完全正确的苏联社会主义实际竟是如此阴森可怖。中国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是不是也会受到同样的怀疑与指责呢?虽然他本人当时威望之高如日中天,但是是不是身后也会遭到赫鲁晓夫式的攻击呢?

可以说,从此以后毛主席心里就形成了一个“二十大情结”,赫鲁晓夫成了“万恶之源”。这块心病越往后越清楚。

三

毛主席对苏共二十大的最初反应是力主对斯大林要“三七开”,即三分错误,七分成绩,并且以此思想指导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写作。同